



市人大代表、延庆区委书记穆鹏：

通过高品质赛事引导海陀滑雪度假区错位发展

“延庆准备好了”

“延庆准备好了。但在最后的冲刺期,我们还将继续反复演练。”穆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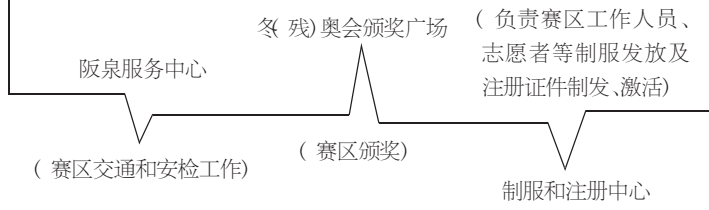
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日正式开幕,延庆赛区会产生21枚冬奥会金牌、30枚冬残奥会金牌。冬奥会延庆赛区包括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两个竞赛场馆,以及延庆冬奥村、阪泉服务中心、制服和注册中心、(冬残)奥会颁奖广场四个非竞赛场馆。

“场馆目前都已建设完成,经过了国际奥委会(IOC)以及国际单项组织的验收和测试,比如高山滑雪中心就经过了相约北京系列赛的高强度测试。此外,场地的硬件、临时设施搭设也在2021年12月31日前全部完成了,景观布置里使用了大量冬奥的元素。”穆鹏介绍说。

场馆建设已就绪,赛时运行也很关键。以运行团队为核心,奥组委的业务骨干、属地、业主等多方团队都围绕体育竞技、赛事服务做好冬奥保障。穆鹏表示,目标是要做到98%甚至是100%的问题都要在场馆运行团队内部解决。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为全面检验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赛前运行状态,2021年12月11日-12日,延庆冬奥村已按照“能测尽测、能测必测”的原则开展了一场全要素运行测试。360人组成的代表团和观察团,同1100名工作人员共同参加4个应急演练场景、6大类

1月6日上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开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2重点任务清单中,明确了北京将努力交出冬奥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作为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区来说,更是肩负着一份历史性的重任,北京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人大代表、延庆区委书记穆鹏。



测试项目70多个分项测试科目的演练,为2022年1月27日正式开村奠定了基础。

“延庆还是第一次办冬季运动的高规格赛事,有很多规律还无法完全掌握。因此,我们也在复盘此前发现的问题,针对各类问题反复进行演练,找问题、改问题。”穆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简约但不简单”

“简约、安全、精彩”,这六个字是去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冬奥筹办情况时提出来的。穆鹏表示,在新的防疫形势下,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也是延庆办赛的基本遵循。

“但是,简约不是简单。”穆鹏说,一届奥

运会的正常举办涉及方方面面。比如运动员的竞赛情况、工作人员和各类客户群体的工作、转播的精彩程度等。其中,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包括运行安全、防疫安全。

防疫安全仍是此次办赛的核心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对疫情的严峻性、复杂性有了充分的认识,也有成功抗疫的经验,这些经验都转化成了防疫手册,是我们和国际奥委会共同达成的第二版。经过与国外的代表队充分沟通,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反馈,表示愿意遵守和支持。”穆鹏说。

据了解,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在2021年12月13日发布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对第一版手册进行了补充,在疫苗接种、海关



入境要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冬奥赛时、闭环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信息。

当地时间1月5日,国际奥委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代表、各国和地区奥委会以及国际冬季奥林匹克运动联合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对于所有人来说,冬奥会的北京时间已经开启。要竭尽全力确保运动员的冬奥梦想不会在临行前功亏一篑《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不仅仅是一本规则,更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赛后寻求错位发展”

延庆赛区位于小海陀山区域,海拔最高

点2198米,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政府工作报告的2022重点任务清单中提出,2022年要落实遗产战略计划和场馆赛后利用计划,最大限度发挥冬奥遗产作用。冬奥会后,赛区场馆如何利用?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延庆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工作正在同步展开。

“海陀区域是北京第三个被国际奥委会命名为‘奥林匹克园区’的,就是为了让它可持续发展。未来,我们将重点打造冬季海陀国际滑雪度假区。我们希望在赛后,继续通过举办高品质的赛事引导海陀地区和其他区域错位发展,因为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这两个场地是国内唯一符合奥林匹克标准的,我们将利用好这个‘唯一’。”穆鹏进一步介绍称,“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两个场地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很多运动员都非常喜欢,富有挑战;同时,我们也会照顾到大众的需求,因为原有的赛道也都符合滑雪爱好者、初学者的需求,我们也会把海陀打造成面向老百姓的休闲度假区区域。”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022重点任务清单中也明确提出,加快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推动延庆赛区滑雪场及基础设施新改扩建,打造国际滑雪度假旅游胜地。就在2021年12月29日,文旅部及国家体育总局刚刚发布了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名单,共有12个度假地入选,其中就包括北京延庆海陀滑雪旅游度假地。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王晨婷



三孩生育政策来了 如何真正“生”效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三孩生育政策有着广泛牵动性,不光关系适育家庭,还涉及生殖、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只有完善配套措施,才能解决适育家庭不能生、不想生、不敢生的问题。正在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多位委员提交了和三孩生育政策相关的提案。1月6日,北京商报“两会三人行”栏目邀请到三位政协委员,就如何让三孩生育政策更好落地建言献策。

市政协委员、北京五洲妇儿医院总经理黄金雄：

利用辅助生殖技术降低不孕不育比例

“我国不孕不育发病率为7%-10%。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普及不孕不育防治基本知识,有利于提高公众生殖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育龄夫妇健康孕育。”这是2021年10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的《不孕不育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中的内容。

“现在导致不孕不育的因素比较多,对于输卵管阻塞、精子异常、高龄卵巢功能减

退、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治疗或规避遗传性疾病等患者,都可以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实现生育的梦想。”黄金雄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道。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17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共有27家,全国各省(区、市)均有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服务可及性

不断提高。患者可登录国家卫健委网站查询。

黄金雄还表示:“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后,来北京五洲妇儿医院咨询辅助生殖的患者多了,多是40岁左右的患者。通过医联体和多点执业建设,我们邀请到了国内知名医院的妇产科、妇科内分泌、辅助生殖等领域专家定期会诊与学术交流,搭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绿色平台,满足患者的辅助生殖需求”。

市政协委员、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朱春梅：

加大对儿童健康医疗保障的投入 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

虽然我国出生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但是出生人口呈现下滑趋势。朱春梅提到:“生育意愿不强的核心原因在于,养育孩子的巨大经济压力,住房、育儿、医疗方面的福利不健全,工作与家庭时间安排冲突等”。

如何落实三孩配套支持政策,朱春梅从自身行业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儿科

医生紧缺一直是很严峻的问题,放开三孩后,儿科医生的紧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儿童医疗保障的投入,比如加大对儿童医院建设的投入,完善儿科医生培养体系。我还建议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和待遇,让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个职业,这样才能保障二孩、三孩孩子的健康”。

同时,朱春梅提到要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全科医生执行全科医疗的卫生服务,一般是以门诊形式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手;全科医生主要是在一些基层、社区医院。如果是普通的小病,患者就可以在基层、社区医院就诊,避免集中到大的三甲医院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

市政协委员、微博CEO王高飞：

合理分摊用人单位成本 引导企业主动保障女性生育权益

三孩生育政策也是公众的热门话题。公众关心的不光有医疗成本,还有生育成本和社会保障,针对这两个方面王高飞认为:应该探索建立科学的生育成本多方共担机制,适度平衡员工和企业利益,强化社会保险保障功能。

王高飞的建议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等合理分摊用人单位的成本,引导企业

积极主动参与到保障女性生育权益中来。比如对女职工达到不同比例的企业设定不同的税收优惠、专项补贴、产后返岗专项补助等优惠措施;按照当年生育女职工产假和男职工陪产假休假天数给予企业落实产假奖励性补助;或对生育女职工、产假、护理假等替代用工工资在企业缴税前加倍扣除,多形式分摊、补偿企业产生的部分额外成本。”

在健全社会保险保障功能方面,王高飞建议:“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男性员工陪产假和孩子三周岁前夫妻双方享有的育儿假纳入生育保险补贴保障范畴;加大生育补贴力度,进一步发挥生育津贴激励作用,在保障育儿家庭收入的同时,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制度”。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 延伸阅读 ·

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关注托育供需缺口 建议设立社区家庭托育点

0-3岁儿童的托育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1月6日上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2年要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在北京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期间,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也向大会提交了名为《支持在社区设立家庭托育点》的提案,围绕该提案,北京商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托育机构是承担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重要场所。”胡澎直言,从行业发展角度看,我国目前的0-3岁婴幼儿托育行业处于发展初期,一些托育机构设置写字楼、底商或商场等地,房租、运营成本都比较高,这导致托育收费也偏高。部分家庭还会选择育儿嫂,但育儿嫂的价格也较为昂贵,让一般的工薪家庭望而却步。

此外,对双职工家庭来说,父母双方的工作压力都比较大,在照看婴幼儿时会更加力不从心。“尽管现在已经颁布出台了三孩政策,但可能目前更需要解决的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问题,由此,出台政策来缓解0-3岁婴幼儿托育的压力势在必行。”胡澎谈道。

国家卫健委在2021年7月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相关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的缺口较大。

“我主要做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从国际视野来看,一些西方国家和日本已经推行的多样化托育服务特别是家庭托育点的服务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何为家庭托育点?对此,胡澎这样释义,家庭托育点主要由个人、家庭或机构在居民住宅中以收费的形式为0-3岁婴幼儿提供照顾服务,其特点是嵌入社区,方便家长接送,面积不大,投入成本低,

服务灵活,收费合理。

在调研过程中,胡澎发现,目前国内的一些大城市已陆续出现了新型的家庭托育点。“我注意到,这些家庭托育点的服务项目有月托、日托、时托、夜托、幼儿园接护等,如果家长临时有急事,也能提供临时托育服务。并且这些家庭托育点还可以对育儿家庭提供咨询服务,定期举办一些早教活动、育儿讲座、养育科普等,同龄的小朋友可以在一起玩耍,父母也可以交流育儿经验。”

“所以我就想,北京是否能开展这样的试点,从社区附近选址,既能降低家庭托育点的成本,也方便有需求的家长。”由此,一份关于社区设立家庭托育点的提案应运而生。胡澎指出,北京市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途径,鼓励民间设立家庭托育点。也可探讨对街道、社区办公用房、养老驿站等社区公共区域进行改造设立家庭托育点。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托育点有150平方米就够了。”胡澎表示,为鼓励兴办家庭托育点,她也建议对已有或新成立的家庭托育点给予一次性开园补贴,并对家庭托育点的租房费用进行一定的补贴。

任何行业的良性发展都离不开规则的制定。在发展托育产业时,除了加快配套设施和机构的建设,相关规定和管理办法也必不可少。对此,胡澎呼吁尽快出台《北京市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

“在办法的细则中,要明确登记管理、人员资质、服务规范、监督管理等制度规范,促进托育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胡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托育人才存在资质不完善的问题,产业要注重对托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比如在职高、大专等教育机构中增设托育师培养方向,或对有育儿经验的中年女性进行培训,加快培养托育人才。”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